

幽灵政治学与“往北走”： 《量子幽灵》的未来革命想象

曹晋源

一、一战再战：告别忧郁的“幽灵政治学”

以往对革命的梦想往往发生在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之中，在科幻文学这个领域内却十分少见。大多数科幻文学，在想象未来以切近当前人类困境之时，总会表达出一丝忧郁，而非革命的期望，譬如陈楸帆的《荒潮》，也譬如威廉·吉布森创作的《神经漫游者》。生活在其所描绘的新世界的人们，因为资本的压迫和技术的滥用，失去了对旧现实的掌握。在此间，历史似乎唯有终结这一条路，世界唯有一丝希望尚存。

历史终结论虽然看上去是老生常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所遭遇的是新的现实：自苏联的经济模式黯然离场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迅速崛起，一种信息技术与资本垄断所结合的控制社会随即诞生。在这样的社会里，主权者的规训统治被无处不在的信息控制所取代，人们看似自由，却仍要服从于普遍的标准和隐蔽的治理。与此同时，后福特主义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与休闲严格区分的组织方式，所谓弹性化的工作制度使人们永远处于可调用的工作状态。这种新兴的工作/生活组织方式与跨国资本的垄断剥削、信息调控的控制手段形成合围之势，大众从而失去对生活整体的感触，无法轻易触摸到日常生活的质感。这一切致使文化丧失了创新和把握当下的能力，历史时间因此陷入了停滞状态，未来仿佛在不断地退潮，直至消逝。

种种令人忧世亦忧生的现实，即便在今日也未退去，而旨趣在于思想实验的科幻文学，自然要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找到来自未来的种种其他可能。在相似的高科技低生活的未来世界框架下，有的科幻作品描述了如何在夹缝中寻找希望（如《赛博朋克2077》），有的则是构想了智能仿生人的反抗革命（如《银翼杀手2077》《底特律：化身为人》），而《量子幽灵》的想象更为大胆，在短短不到24页的篇幅里设想了相对完整的革命之路：革命失败——逃亡与追捕——继续革命。

将这条道路简要地扩展，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则故事：在反抗跨国科技公司黑砧的革命失败以后，意外被成功植入量子芯片的李衍开始了20年的逃亡，他因革命失败而失去了妻子涂宁，又因其极端芯力观测到妻子在量子态中的灵魂。20年间，李衍与“量子幽灵”过着数字隐士一般的生活，直到与闯进家门的追捕者卢明对峙后，李衍才明白，自己是量子宇宙的节点人物，而他持续的观测，正将未来锁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轨迹上。未了，李衍将革命的火种托付给儿子李绎后，毅然终止观测、投身死亡，以期在未来换回革命成功的可能。

《量子幽灵》的革命之路，重点在于“幽灵”二字。幽灵在革命与政治的领域并非封建伪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幽灵（Gespensst），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成为萦绕着资本主义的噩梦幽灵。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发展了一种“幽灵政治学”，旨在继承马克思

的精神遗产。复活马克思的幽灵，就是呼唤一种颠覆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新国际”。而新国际要求的革命，是要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制度和标准相决裂，以此对历史进程进行彻底的审查，所以它是一种打破常规的中断行为，需要有创新精神。^①马克·费舍依据自身对德里达理论的理解，发现了21世纪初潜藏在大众文化里的幽灵，它们连接已逝之物与未来之物，具有“幽灵学的忧郁”^②，此种忧郁拒绝屈服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秩序，因而具有政治维度。

《量子幽灵》有其独特的“幽灵政治学”。弥漫着忧郁情绪的李衍，既拒绝驱除死者，同时也质疑超级智能与资本联姻的未来。幽灵在此可以被理解为未完成的哀悼，一种沉默的政治姿态。然而，过于持守于忧郁，只会陷入无力决断的境地。于是，当李衍领悟到他是连接着量子科学世界与人类可感世界的节点人物时，他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绝对责任”：必须以自杀的形式将属己的死亡赠予未来。而节点人物的消失，意味着终止一个持续运行并输出单一历史的复杂观测系统，薛定谔的猫再次回到死猫与活猫的叠加态之中，历史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李衍的决断，代表着未来世界的革命者从左翼忧郁走向了积极的“幽灵政治学”。“量子幽灵”与他共赴死亡，代之以革命者的幽灵姿态出现，寄托于后代复活“革命的幽灵”：“我们反抗过公司这样的资本巨兽，我们失败了，但留下了痕迹……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会有更多的人醒过来，直到我们这样的人成为大多数。”这是一种辩证的“幽灵政治学”，也是一种独属于科幻文学的浪漫想象，它进一步构思了未来的革命主体和可能的新秩序。

二、超级智能时代的革命主体： 从诸众回到工人阶级

在《量子幽灵》中，“幽灵”也标识出革命主体的变化：成为幽灵的上一代革命主体，与复活幽灵、继续革命的下一代革命主体，具有诸众与工人阶级的差异。以李衍、涂宁和郑图三人为代表的革命主体，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身为非物质生产者的“诸众”。诸众是松散的，每位个体在抵抗组织云雀里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譬如，李衍三人的身份分别为游商、软件工程师和研发人员，政治面貌分别是“一个安那其”“一个逍遥派”和“一个革新者”。诸众在组织结构上偏向于水平化和去中心化，剧中身在抵抗组织的每一个人都是志愿者，并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也有一名领袖进行垂直领导，即后续被揭示为试图窃取革命果实的硅基人卢明。

相较之下，未来革命的继承人李绎则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与诸众的区别在于：“工人阶级是一种‘排斥性的概念’，它不包括在非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人和其他没有正式工作的穷人。与之相反，诸众是一个纳入性的概念。它包含了原本不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群体，大大扩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主体的范围。”^③身为末代人类产业工人的一员，李绎对整个阶级被压迫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自觉，并敢于带领工会与公司抗争。可以说，《量子幽灵》通过对李绎形象的刻画，已经渲染出无产阶级投身于未来革命的前置条件：一是将追求和维护私人利益的个体诉求，转化为对私有制的总体批判，二是具有了团结彼此、联合他人的自觉，三是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的阶级意识。而更具客观必然性的条件在于，李绎是硅基时代最后一批人

^①“我理解的革命是一种中断行为……所有的革命都需承担伦理责任。”参见[法]雅克·德里达，[法]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M]。苏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106。

^②“这种忧郁症并非源于放弃欲望，而在于拒绝屈服。”参见FISHER M. 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M]. Hants: Zero Books, 2014.

^③工人阶级与诸众更详细的区别，参见谭锐捷·论哈特与奈格里革命主体理论的内在矛盾——兼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主体建构[J]。江汉论坛，2025(9)：73。

类产业工人，是真正的无产者，因此同一切阶级的对立是最为彻底的，也就最有理由产生出彻底革命的意识。

《量子幽灵》对上一代革命主体和未来革命主体的划分，以及诸众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在当今的现实中有清晰的对照。诸众(multitude)的概念导源于西塞罗，原本意思是自然状态下人的群集，在当代被奈格里和哈特赋予了政治能动性，是反抗后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的特殊性源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生产活动的变化：“当今的生产活动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而应更广泛地视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商品的生产，更涵盖传播交流、人际关系及生活方式的生产。”^①进而言之，社会生产的多元形态构成了诸众，后者的模型就是分布式网络：网络是开放的，每个节点保持自身差异的同时又相互连接。在诸众的网络中，所谓的新无产阶级形象从工人群体转变为了互联网科技公司里的工程师、开发者群体，而本剧中的涂宁与郑图正对应着这样的非物质生产者形象。

将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的问题在于，如果革命的队伍并不纯粹，那么他们就缺乏鲜明的旗帜引导。以此观之，以差异化和去中心化的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缺陷就在于彼此间没有真正认同的目标，因而也无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这是现实中占领华尔街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量子幽灵》里涂宁等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另一相关的层面看，如若在去中心化的诸众网络中引入垂直管理的中心领袖，只会造成两者之间的相互反噬。在目睹占领华尔街运动失败后，奈格里与哈特将诸众的革命运动寄托于领袖的登场，但少数精英并不能担保革命队伍的先锋性；而《量子幽灵》通过思想实验的方法告诉我们，主导诸众革命的领袖很可能

窃取革命的果实，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的原子化而构想以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方案，似有其正当理由。不过，试看全球科技供应链对工人阶级持续性的阶级压迫，就能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体理论仍未过时。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回归，是因为受到阶级压迫的无产者，其革命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一阶级特权，而是为了消除阶级。可见，无产阶级具有诸众所不具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历史经验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别于无法组织起有生力量的诸众，无产阶级可以从自身中成立先锋政党以领导革命，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以上种种，都是《量子幽灵》将未来革命寄希望于以李绎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缘由，他们所要实现的，是科技服务于人民的公正社会秩序。

三、“往北走”之后：想象未来正义的新秩序

《量子幽灵》对于未来秩序的形象、现存秩序的批判，以及构想的革命方案，都集中于“往北走”这句台词上。它首先意指去往一个科技为民的所在。《量子幽灵》的舞台上可以听见三次指引着“往北走”的声音，幽灵(涂宁的灵魂)、卢明、李衍以不同的立场、口吻确认了这个所在的存在：只要往北越过群山，就能抵达一个连公司也无法掌控的国家。“那里科技为人而存在，人类和硅基劳动者互相认同，有平静的生活、共同的信仰。那里没有战乱，没有纷争，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往北走”也是幽灵的指令，是要走“涂宁走的那条路，让科技服务于大众而不是资本的那条路”。这条指令蕴含着革命者的允诺。^②生

①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 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xv.

②“允诺必须保证兑现，也就是说不要停留在‘精神的’或‘抽象的’状态，而是要导致所允诺的事变，或者说行动、实践、组织等等的新的有效形式。”参见[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0.

活在一个受压迫的未来社会中，革命的允诺不仅要出自于马克思所言的历史必然性，也必须出自于伦理上的必然性，即让沉默者不再沉默，让革命失败后仍要革命。李衍与涂宁关于革命的允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们用流血牺牲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担保。不再祈求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方案是由涂宁的老师程穆所期待实现的，仿佛为人脑植入量子芯片带来智力飞升，就可以从硅基替代中拯救人类；而是效法谭嗣同，以流血就义的方式唤起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达成正义和解放的允诺。

最后，“往北走”也暗示了未来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量子幽灵》的世界版图可以一分为二：被黑砧公司所治理的区域，或公司无法渗透的区域，后者就是“往北走”会抵达的“最后一个属于人民的国家”。而公司所治理的范围可以从北美跨越到南亚：跨国资本以数字殖民的方式控制了大半个地球，将自身的霸权逻辑不容辩驳地设定为社会秩序的准则。其后果之一：人类将数字殖民的分类原则内化，把自身贬低为奴隶，并迎合技术所制订的一切标准，就像剧中的人类低眉顺眼、屈膝迎合，他们“染发涂脸，就为了像硅基人。”其后果之二：公司将数字人项目包装成惠民活动的方式低价兜售给平民，使得人们在看似自由的选择中接受了灵肉分离的切割术，舍弃身体并把精神交予资本来治理，从而放弃了参与抵抗、争取权利的可能。

在未来数字殖民主义的管辖下，即便地处南亚边境的人们也失去了自身的数字主权，本国民的数字资源、具身权益尽由他人掌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量子幽灵》批判了当今的数字殖民主义，并呼应了全球南方的共同愿

景。所谓的数字殖民主义，是欧洲殖民扩张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其背后的霸权逻辑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二元对立，在经济上展现为世界市场流通的单向性，在政治上表现为强国对弱国的不平等，甚至在数字帝国主义内部也呈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一套逻辑在未来极可能极端化为智能体与人类的优劣之分，剧中的卢明就是这样一种霸权逻辑的承载角色。与之相对，全球南方就是要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现实，通过构建共同体来抵御霸权的干涉。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景是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附性，并实现真正的“实质平等”；为此，需要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以武装斗争与联合互助等方式谋求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秩序”，打破旧有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朝向真正的人的平等与解放。

质言之，《量子幽灵》的革命想象落脚于对公平正义秩序的期盼与允诺，这种期盼与允诺有理想国度的“真实”存在作为保证。其想象的方案是以革命者流血牺牲的方式唤起自下而上的革命，颠覆数字殖民主义及其霸权逻辑，最终走出一条科技服务于人民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必须由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来实现。只是，在科幻的想象里，要在一个逐渐灰暗、充满压迫的高科技世界展开上述的革命道路，就需要承担观测者角色的节点人物告别革命失败后的忧郁，在停止观测量子幽灵的同时，通过自我牺牲而成为革命者的幽灵，从而走向积极的“幽灵政治学”。如此才可能将未来修正并使之重回混沌态。

（曹晋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媒介研究。）

【责任编辑 邱佛梅】